

理念论与实在论视域下的教育哲学之争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研究

田子乐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4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1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8日

摘要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体系, 植根于二者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根本对立。本文从理念论与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出发, 系统比较二者在教育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本文将从四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 首先分析柏拉图理念论哲学对其教育观的决定性影响; 其次阐释亚里士多德实在论哲学对其教育观的理论奠基; 然后系统比较二者在教育哲学上的根本分歧; 最后探讨两种教育哲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启示。研究表明, 二者在教育目标、知识来源、认识路径与伦理实践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 不仅构成古希腊哲学内部的重要张力, 也为后世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两种基本范式。

关键词

理念论, 实在论, 教育哲学, 认识论

The Debate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of Forms and Re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lato and Aristotle

Zile Tian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November 4, 2025; accepted: November 25,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8, 2025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ystem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are rooted in their fundamental oppositions

文章引用: 田子乐. 理念论与实在论视域下的教育哲学之争[J]. 哲学进展, 2025, 14(12): 363-368.
DOI: [10.12677/acpp.2025.1412595](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2595)

in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 of theory of forms and real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discussion will delve into four dimensions: first, analyzing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f Plato's idealist philosophy on his educational views; second, explai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ristotle's realist philosophy for his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third, systematically compar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finall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these two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wo form a sharp contrast in educational goals, sources of knowledge, paths of cognition, and ethical practices, not only 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tension with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but als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wo basic paradig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t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Keywords

Theory of Forms, Realis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pistemolog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育在古希腊哲学中不仅是实践技艺，更是关乎灵魂完善、知识本质与理想政体的核心哲学议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两大奠基者，其教育思想深植于各自的哲学体系之中，体现了理念论与实在论在认识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上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反映了师徒二人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更预示着西方哲学此后两千余年发展的基本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界对二者教育思想的比较多集中于教育制度与课程内容的比较分析，而较少从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进行系统对勘。这种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二者教育哲学的根本差异，也弱化了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多篇》等对话录中构建的教育体系，与其理念论、回忆说和灵魂转向理论密不可分；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的教育思想，则与其形质论、潜能现实说和经验认识论相互印证。

本文从理念论与实在论的哲学分野出发，深入剖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教育哲学上的根本分歧。通过系统梳理二者的形而上学基础、认识论预设及其在教育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试图在哲学史视域下重构二者教育思想的深层对话，揭示其对于当代教育哲学建设的理论价值。

2. 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及其教育观的认识论基础

柏拉图的教育哲学建立在其理念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基础在《理想国》《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中得到系统阐述。柏拉图认为，真实的存在是超越感官世界的理念，而可感世界只是理念的摹仿与分有。这种二元世界观将实在严格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永恒不变、完美无缺的理念世界，它是知识的唯一对象；另一方面是流变不居、充满缺陷的现象世界，它只能产生意见[1]。

理念论的核心主张在于，理念不仅是知识的对象，更是存在的本质。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通过“线段比喻”清晰地划分了认识的四个层次：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前两个层次属于可见世界，后两个层次则属于可知世界。这种认识论等级制直接决定了柏拉图教育哲学的基本取向——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将灵魂从低层次的认识状态提升到高层次的认识状态。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提出的灵魂回忆说为其教育哲学提供了心理学基础。他认为，知识不是从外部灌输到灵魂中的，而是灵魂对前世已有的理念知识的回忆。这一理论在《斐多篇》中得到进一步发挥，柏拉图通过“几何学与奴隶”的例子证明，即使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在适当的提问和引导下也能得出正确的几何结论，这说明知识原本就存在于灵魂之中。

基于这一认识论立场，柏拉图对教育的本质作出了革命性的界定：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引导灵魂“转向”的过程。在《理想国》著名的“洞穴喻象”中，他将常人的认知状态比作被束缚在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并将其误认为真实。而教育的过程就是解除束缚，迫使囚徒转身，逐步适应光明，最终看到洞外真实的理念世界。这一比喻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认识提升的过程，也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它不是简单地增加知识，而是实现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变。

柏拉图将辩证法视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和通向真理的唯一路径。在《理想国》第七卷中，他明确将辩证法置于数学学科之上，认为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不借助任何感官经验，纯粹通过理念本身认识理念，最终达到善的理念。辩证法不同于一般的辩论术，它是“不用任何感官，单凭逻辑思维走向本质本身，并且坚持到底，直到通过纯粹思维认识到善的本质的那个思想过程”。

这种对辩证法的推崇体现了柏拉图教育哲学的理性主义特质。在他看来，感性经验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干扰灵魂对纯粹理念的把握。因此，他的教育设计严格排斥经验性内容，强调通过数学等抽象学科的训练，使灵魂习惯于脱离感性事物进行纯粹思维。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取向使得柏拉图的教育哲学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也为后世先验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

3. 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哲学及其教育观的方法论路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九章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系统批判，这些批判构成了其教育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他通过“第三人论证”等逻辑方法证明，将理念视为独立于具体事物存在的实体会导致无限后退的荒谬结论。与此相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不在物外”的基本原则，认为形式与质料共同构成具体个体，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这种实在论立场导致亚里士多德对知识来源的理解与柏拉图根本不同。在《论灵魂》第二卷中，他明确提出“蜡块说”，认为灵魂就像一块蜡块，感觉在灵魂上留下印记，所有知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2]。这一认识论原则彻底颠覆了柏拉图的回忆说，为经验主义教育观提供了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理性思维的重要性，但他坚持认为，没有感觉经验，理性思维就失去了加工的材料，如同消化系统没有食物一样无法工作。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发展的潜能与现实理论，为其教育哲学提供了核心框架。他将教育过程理解为人的潜能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理解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中得到充分展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具有发展的潜能，但这些潜能需要通过系统的训练和教育才能转化为现实。就像建筑师通过建造活动成为建筑师，人通过公正的行为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的行为成为节制的人。

基于这一理解，亚里士多德对教育的本质作出了与柏拉图截然不同的界定。教育不是灵魂的“转向”，而是通过习惯养成和理性教导促使人的潜能充分实现的过程。在《政治学》第八卷中，他详细讨论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训练和教育，使其身体、情感和理性得到和谐发展。这种教育观强调教育的自然基础和发展规律，与现代发展心理学的某些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对实践智慧的阐述，为其教育哲学注入了鲜明的实践导向。他认为，完整的人格教育不仅包括理论理性的培养，还包括实践理性的发展^[3]。理论理性关注永恒不变的真理，实践智慧则关注在具体情境中如何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两种理性能力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但它们的发展路径和教学方法各不相同。

这种对实践智慧的重视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设计比柏拉图更加全面和平衡。在《政治学》第七、八卷中，他提出了一个包含体育、音乐、读写、绘画和科学在内的综合课程体系，旨在促进身体、品格和理性的和谐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强调不同教育阶段应该有不同的重点：童年时期注重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青年时期注重情感陶冶和理性启蒙，成年时期则注重实践智慧和公民责任感的培养。这种阶段教育思想体现了对人性发展规律的尊重，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教育哲学的实践智慧。

4. 哲学立场对立下的教育观分歧：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教育哲学上的分歧，首先体现在知识论基础上。柏拉图坚持知识的先验性，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对永恒理念的把握，这种知识只能通过理性直观获得，感性经验反而构成障碍。亚里士多德则坚持知识的经验来源^[4]，认为普遍概念是通过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经验抽象而来，理性思维必须建立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之上。这种知识论分歧直接导致二者对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不同选择。柏拉图的教育体系排斥一切与感性经验相关的内容，强调通过数学、几何等抽象学科训练理性思维能力，最终通过辩证法直达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教育应该从具体经验出发，逐步引导学习者从个别中抽象出普遍，从现象中把握本质。他设计的课程既包括体育、音乐等实践性内容，也包括文法、修辞、哲学等理论学科，体现了一种更加平衡的教育理念。

二者在教育哲学上的分歧还源于其不同的本体论预设。柏拉图的理念论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完美世界，教育的目标就是引导学习者离开变化的现象世界，进入永恒的理念世界。这种本体论导致其教育哲学带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和禁欲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则坚持个体事物的第一性，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教育的目标不是离开现象世界，而是在现象世界中实现人的本质。这种本体论差异在二者的教育目标设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柏拉图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哲学家，使他们能够超越世俗事务，专注于对永恒真理的沉思。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目标则是培养良好公民，使他们能够在城邦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本质，过上幸福的生活。前者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后者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前者追求真理的绝对性，后者关注幸福的现实性。

在教育路径的选择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歧还反映了他们对人性理解的不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提出的灵魂三分说将理性置于统治地位，认为教育的关键是培养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控制能力^[5]。这种理解导致其教育设计强调严格的纪律和理性的训练，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灵魂功能的划分则更加细致^[6]，他认为灵魂的营养、感觉、欲望、运动和理性等功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教育应该促进所有功能的协调发展。这种人性理解导致其教育路径更加注重阶段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他特别强调习惯养成就在品格教育中的重要性，认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

在方法论层面，柏拉图推崇的辩证法与亚里士多德倡导的归纳—演绎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辩证法强调通过问答和辩论揭示矛盾、超越假设、直达第一原理，这种方法适合少数天赋卓越者，但难以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法则强调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归纳形成普遍原理，再通过演绎推导出具体结论，这种方法更加系统化，适合大规模教育实践。这种方法论对立具体体现在二者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中。柏拉图的数学教育强调纯粹的思维训练，鄙视实用计算；音乐教育强调旋律和节奏对灵魂的净化作用，排斥娱乐功能^[7]。亚里士多德则承认实用知识的价值，认为读写、计算等技能对谋生和公民生活都是必要的；音乐教育既注重道德熏陶，又承认其娱乐和休闲功能。这种差异体现了二者在教育方法论上的根本不同。

5. 两种教育哲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哲学启示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分别开创了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两个重要传统。柏拉图的思想经由新

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的神学改造，在中世纪早期成为修道院教育的精神资源，后来又通过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学园和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得以传承发展。其理念论教育观强调精神的超越性和理性的纯粹性，对西方博雅教育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教育观则通过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阿拉伯哲学家的诠释，经由托马斯·阿奎那的系统整合，成为中世纪大学教育的理论基础。近代以来，培根的经验论、夸美纽斯的泛智主义、卢梭的自然主义乃至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传统，强调教育的经验基础、自然适应性和社会实践性。

在当代教育哲学讨论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柏拉图提醒我们关注教育的超越维度，即在传授实用知识的同时，不应放弃对真理、正义和美善等永恒价值的追求。在工具理性泛滥、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代教育环境中，这种超越性维度显得尤为珍贵。亚里士多德则为我们提供了平衡理想与现实的理论智慧。他既强调教育应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承认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现实；既重视理性思维的培养，又关注品格和习惯的养成；既追求理论的卓越，又重视实践的智慧。这种中道立场对解决当代教育中的诸多困境——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矛盾、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张力、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冲突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对于当代中国教育哲学建设而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话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教育传统中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精神修养的取向与柏拉图的精英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知行合一、强调经世致用的智慧又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相互呼应。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这两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具体而言，柏拉图的教育哲学启示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应当保持对教育本质的哲学思考，避免陷入纯粹技术化的误区。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则提醒我们，教育理论和政策应当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尊重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先验思考与经验研究、价值导向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才能构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实践效度的现代教育哲学体系。

6. 结论

通过系统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分歧植根于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差异，体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先验论与实在论的根本对立。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将教育理解为灵魂转向真理的过程，强调理性的纯粹性和知识的先验性，其教育哲学具有鲜明的超越主义和精英主义特征。亚里士多德则从实在论出发，将教育理解为潜能实现的过程，强调经验的基础性和发展的自然性，其教育哲学体现了平衡中道的实践智慧。

这两种教育哲学传统各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柏拉图的思想深邃而富有启发性，但对感性世界的贬抑和对大众教育的忽视使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全面而富有实践性，但对经验归纳的过度信赖和对理论思维的相对忽视也值得警惕。一个健全的现代教育哲学体系，应当汲取两种传统的精华，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经验、普遍与特殊、个体与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对话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为思考当代教育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重新审视这一经典对话，有助于我们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构建既尊重普遍价值又适应本土情境，既追求真理又关注幸福的教育哲学新范式。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2]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4] 陈康. 论希腊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5]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6] 博伊德·金. 西方教育史[M]. 任宝祥, 吴元训,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7]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